

■新作聚焦 何建明报告文学《上海表情》:

倾情再现上海战疫的独特“表情”

□王晖

在席卷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当下,诸多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作家以笔为旗,投身文艺战疫的行列之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故滞留上海数月的何建明没有停止思考和行动,倾情写下再现上海战疫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上海表情》,从一个侧面生动印证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以及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的又一英勇壮举。

从上世纪90年代创作《共和国告急》开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就始终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紧跟时代的“在场”、关切现实的“使命”、正向阐发的“情怀”、艺术精进的“创新”是其写作风格的鲜明表征。“国家叙述”最能显示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基本特质。在文本叙说的对象上,他精心选择那些具有全国性或全球性影响的事件与人物,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典型;在叙述方式上,他采用全景式、多角度、多层次的高屋建瓴式描述,以此显示国家形象、文学气势与民族风格。可以说,“国家叙述”是“时代文体”报告文学在逼近现实、思考现实和书写现实时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位能够将各种题材把握自如的多面手,何建明在再现其“国家叙述”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清晰的艺术营构策略,努力使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在艺术传达上各显千秋,《上海表情》亦是如此。

作为何建明新近创作的包括《浦东史诗》《革命者》和《第一时间》等在内的上海系列报告文学之一,《上海表情》是其“国家叙述”的另一种表达,即以以小切口——非疫情中心化的上海战疫为再现对象,以近乎“个人化”视角的亲眼所见和亲身体验,而不是采取全景式多维度观照为叙述方式,清晰而生动地再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上海经验”,以及由此而凸显的上海战疫的丰富“表情”。在纵横交错的时空当中,《上海表情》由描述上海发现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即“一号病人”开始,继而写到上海市委政府第一时间以大决战姿态打出漂亮“组合拳”,最终铸就强力抗击疫情的“黄浦江防线”。以其别具一格的报告向受众展示上海战疫的深刻意义,即作者在作品中所言:“‘上海方案’,其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和现代城市史中的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诗篇”,“它是庚子年中国

‘疫’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上海自己独立的和我个人的‘疫’战史”。尽管作品并非对于武汉这一新冠疫情风暴中心的直接再现,但其所描述上海战疫的“表情”,特别是其中成功的经验,给予中国战疫、乃至仍然还在持续的全球战疫以重要启示。这既是《上海表情》赋予描述对象本身的深广内涵,而其本身也构成了上海战疫的独特“表情”。具体而言,这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表情”再现。

首先是宏微相间的“表情”再现。在作品中,作者以细腻笔触表现上海市委政府领导的“战疫级”果断决策、周密部署、迅速行动;上海人的全方位战疫——流调工作、一号病人的发现和治疗、张永振教授和张文宏医生的直言、机场救援、国际社区隔离、爱情街上淡定的“谈情说爱”;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屏牢”酒店、超市购物、观察商场医院、与医学专家电话交谈、喂喂野猫等。呈现出由领导高层、各界民众、作者个人所结构而成的参与战疫、感受战疫和体验战疫的宏微相间的三个层次。这无疑是一种有关上海战疫的纵向叙述,这种叙述还表现在作品对于上海战疫历史经验的描述,譬如“对‘疫’,上海早有招”一节对于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2003年抗击非典等,力图以此表明“有经验”的上海曾经以最小的牺牲“捍卫了大上海的尊严”,凸显上海在城市管理、疾病防治、重大灾难事件处置等方面所具有的“以人为本”和“人民至上”的科学机制和现代理念。因由上海民众、特别是作者本人两个月深陷“疫”中的“深入生活”与“体验生活”的再现,《上海表情》尽显充满非虚构元素的现场感和亲历性,作者在文本中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城中人和疫中人,是上海的匆匆过客,也是与之前世有缘之人,是作家,也是思想者、体验者和行动者。作品没有避讳表现作者在疫情汹汹之际曾经存在过的惊恐与观望情绪,但更多的是表现作者在敏锐的现实精神、人性良知与责任担当意识的驱使下,心有所感、情有所依、身有所动,毅然成为上海战疫的见证人和再现者。

其次是对比鲜明的“表情”再现。《上海表情》的叙述视野是宽阔的,这不仅表现在对于上海战疫的纵向叙述,也表现在对上海战疫的横向对比等方面。作品重点再现了上海与武汉战疫情况



的对比,譬如“比较后,才知谁的城是真正的城”一节将疫情中武汉医院患者因排队、等床位的混乱局面所造成无辜病亡的悲剧,与“我”亲赴上海超市和医院体验防疫“一级响应”的周全措施相对比,凸显上海从“0”到“0”战疫的完美开局和结局。作品还将镜头推至17年前,将上海战疫与北京抗击非典进行对比,重点描述了北京非典时“一号病人”携带病毒传播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上海应对武汉来沪“一号病人”所采取的果断有效措施。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的对比,反衬出上海战疫的大气、精致、缜密、宽宏和无私。

第三是思辨与抒情融合的“表情”再现。作为何建明的其他“国家叙述”作品相比,《上海表情》更具思辨性与随笔气质,且充满反思意味,凸显报告文学作为思想者文体的基本规制。譬如,在“武汉彻底悬了”一节,作者对武汉初期战疫的失误予以严肃的反思和批评,指出“武汉的疫情发展到后来的局势,与疫情初期一些武汉官场上、一些医疗卫生部门的作风和习惯性思维有着密切关系”;对钟南山等敢于直言的勇士予以褒扬的同时,反思社会生态的另一面,“如果善于打压和诋毁说真话的人的社会与政治生态存在,那受损害的将是这个社会,并将把这个民族引向苦难与灾难”。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战疫,作者并未止于反思,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

《上海表情》在直面与反思中立足人类共有基本伦理的正向阐发,以及对和合、凝聚、志愿、科学、生态、契约等基于传统与现代意识的鲜明宣示,给予当下战疫报告文学、甚至是整个战疫文学以全新启迪。

了诸多建设性意见,譬如建议清明节为新冠疫难者公祭、设立“中国防疫日”、冷静看待灾难中人性的善与恶等,既着眼于当下战疫,更放眼于未来防疫,促人警醒与奋进。作品还将这样的思辨性反思与极富抒情意味的文字紧密结合,在“黄浦江让我泪流满面”、“悲情出诗人”等章节里写下了《致黄浦江:你流动,我心泪涌动》《假如,明天我将死亡》和《见到太阳真好》等诗歌作品。这些诗情随景生、情景交融,将特殊时期多面的“上海表情”:恐怖、寂寞、孤独、温暖、热血沸腾等表现出来,真切地表达出作者置身上海战疫时刻的真实与悲怆、痛苦与感动、礼赞与感恩的百感交集,以及感怀人生、赞美生命、致敬英雄城市的肺腑之声。它们与偏重于理性认知的反思性文字一道,在发散思维的引领下形成叙述的张力,使文本张弛有度,构筑起作品刚健雄浑与柔情优美、浓墨重彩与白描质朴相结合的美学风格。

以上三个方面的“表情”再现使《上海表情》成为融合文学、新闻、历史、社会学、医学和伦理学等诸项人文社科领域要素的复合文本。其在直面与反思中立足人类共有基本伦理的正向阐发,以及对和合、凝聚、志愿、科学、生态、契约等基于传统与现代意识的鲜明宣示,给予当下战疫报告文学、甚至是整个战疫文学以全新启迪,具有值得铭记的现实意义与显在的文献价值。

■创作谈

庚子年的春节过成“疫”情中的“宅”年,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在恐慌和痛苦中,我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国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武汉之痛,痛彻心扉。

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同样的危险袭击到不同城市、不同地区时,有的城市、有的地区应对而成的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他们有序地、科学地、有效地、果断地堵住了疫情在他们那里的肆虐,坚定地保护了人民生命的安全,比如我所写的大上海。当然还有许多值得赞赏的其他省(区、市),他们的防控工作也是可圈可点。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大疫情,竟然让我与上海这座我热爱的城市,共同度过了整个“疫”期——到今天为止正好60天。这60天我干了什么?老实说一天也没有休息。开始的15天,我一直在忙着一项采访任务,有一段时间独自“宅”在酒店,一边颇有些惊恐地与大家一起观望武汉疫情发展、一边躲避病毒的侵袭,同时在创作另一部“扶贫”题材的作品。后来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我内心颇有感触,同时对所处的上海市的战“疫”情况的所见所闻,使我无法再安心和平静了;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去写点什么。武汉人民受过的苦难和他们与病毒进行斗争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同情与敬佩的。同样,那些为了武汉、为了武汉人民和湖北人民而“逆行”向前,无私奉献,甚至英勇牺牲的医务工作者、干部、人民警察、普通公民,也一定要歌颂!那些把防控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让人民和城乡牺牲最小、获得最大安全的行为,也一定要赞美!

疫情袭来后,我们听到、看到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有许多埋怨与愤怒,我们一直在指责这有问题、那有问题。这本身并没有错,但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有几个人真想出现这种坏事呢?到底有几个人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呢?到底有几个领导干部和管理者,有几个我们的城市、乡村,有几个人经历过这样无法想象的、至今还没有揭开病毒真面目的疫情来袭呢?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个干部,甚至一个医生、院士,一个科学家遇到过“新冠病毒”这样狡猾的敌人。既然如此,我们的怨气可能就会少一些,或许会更理性一点儿,更客观地判別是非。其实,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有从不成熟到成熟、到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与困难局面的成长过程。我们应该多一点宽容和理解,给他们多一点自我检讨与自觉成熟的空间。这样,我们才真正可能少犯、不犯重复性错误,少走那些损失特别巨大的弯路。

《上海表情》之所以要写,完全是“意外收获”,或者说完全是一次不同状态下的激情投入。17年前的北京非典时,是我最早提出了“民族危难之际,作家不能缺席”的话。当时我就是觉得大疫情来临时,各行各业都在支援前方作战,我们作家怎么就没有行动?所以我向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金炳华提出了申请:到前线去采访,去写非典疫情与那些“抗非”的人们。哪想17年过去,我们竟然又经历了一场比非典还要猛烈的疫情袭击!这多么不应该啊!

我以为自己已经没有当年那种勇气了,可是后来疫情的发展和上海的战“疫”确实感动了我,于是,我悄悄地走到大街上、走到黄浦江边、走到商场和码头,去亲眼观摩与感受疫中的上海,这让我得到了许许多多平时不可能获得的收获与感受,比如与野猫的互动、比如像偷东西一样进超市买东西等,当然我也一直在把自己身处的上海和武汉作比较,并且不断为来自大上海的那种细致入微的关怀而暖心,也看到了上海因为决策果断而出现的不一样的结局、因为准备充足而具备了不惧风浪袭击的实力等。我发现自己这60天变成了一次最完整和最充实的“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的过程。《上海表情》就此在笔下“滑”了出来。

写到悲情,我的眼眶常常盈满了泪;写到趣事,我也会开怀大笑;写到温暖,我会肃然致敬大上海……上海表情,既是这座伟大城市和2400多万人民的疫中表情,也是这座伟大城市和2400多万人民战“疫”的表情,同样也是我在其中的一些悲喜之情。

它是真实的,有时是悲怆的,更多的是痛苦与感动交织的复杂情感。把它写出来,权当我对这座城市的一份礼赞与感恩。也希望它是对其他城市的一份礼物,因为上海确实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从上海的表情中,我们能够了解“上海为什么是上海”“上海为什么能”的基本道理。

而我知道,这部急就的《上海表情》,仅是我个人眼里的上海抗“疫”之战的前期。它仍然还将面临已经出现的境外输入疫情的严峻考验,那个时候的“上海表情”一定会是另一番精彩与惊心。

致敬上海

□何建明

■第一感受 消弭文学与生活的古老敌意

□徐兆正

胡少卿诗集《微弱但不可摧毁的事物》带有浓郁的自叙风格。以五年为界分出四卷,计:1998—2003庞大固埃、2004—2009恨铁成钢、2010—2014明神、2015—2019坐一个敬亭山和我,将时间连贯起来,就是作者在北京生活20余年的一个缩影。通过言说“我”,胡少卿像大多数诗人一样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在第一辑最初的几首诗里,“我”有时是校园中的学生,有时是凝神屏气注目鸟巢的路人,有时又是辗转难眠、听一夜水龙头流水声的恋人,然而,这个“我”很快就从诗人的唯我论中突围,譬如写于1999年的《对于世界,我没有太多要求……》:“对于世界,我没有太多要求/如果可以,请给我天才/我想用它痛苦的光芒/照亮众人的头顶。”

题目与正文里的“世界”不妨理解为最高意义的神,所引第一节中的“我”仍是直吐胸怀的“我”,但从第二节开始,天才的唯我论便不再铁板一块,在不断退而求其次甚至类似于和神灵谈判的商榷中,出现了卜兆般的裂解。联系此书余下篇幅,作者在20出头的年纪便供出了他接下来要一路深耕的写作母题:天赋与日常的分叉。诗人穿过一条既是世俗的又是精神的漫长隧道,让文学不再是对日常生活的否定,而成其为一份礼赞。

2001年的《平常》一诗中,诗人从容写下“为了度过漫长的日子/平常是必不可少武器”。不过这并非接受日常对精神的全方位统摄,而是说诗人开始在此体认日常的歧义与多解:日常既可以是“我”对前面走着的那五个女生未来生活的预判:“许多年后,她们将离散各地/嫁人、生孩子,陷入无穷的琐事之中/有人贫困,有人被抛弃/有人学会了抽烟/有人被皱纹像烟圈一样蔓延”,(《在路上》)而这种日常此在在一首诗中被作者直接宣判:“啊,这一切如此合理/但令人厌恶至死!”(《电梯里》)日常也可以是白昼与黑夜的对峙,白昼的诗人属于工作,唯有后者属于他自己,如那个早出晚归的人打量自己的桌椅床铺,“一个人的生活是向黑夜致敬”:(《光线》)在夜晚反观半生与童年的仰望,“我费尽力气/就是要挖出命运许诺给我的五十首诗”。(《世界》)《我的白天被占领了》《许诺》夜晚的空间被系于卧室,如同白昼的城市是作者离开诗歌且“在坚硬的水泥地面”老去的空间(《城市》)。

在城市,诗人每天以“三”的节奏生活:“起床后,使人厌倦的是:/刷牙,洗脸,上厕所/出门前,心中默念:/钱包,手机,钥匙”,(《三》)像蚂蚁构筑蚁穴一样辛苦经营自己的

日子,但这并没有让脚下的分寸之地变得结实:“我们花了多少精力和热情来维护自己的身体/可是,它的崩塌也就一瞬间”。(《近来》)可能正因为这一点,即使是一场清晨的雨,也让人感受到微茫人世的深刻虚无(《雨》)。诗人在《明月》中似乎彻底向白昼投降,由少年激烈走向了中年的彷徨:“明月还能不能照见/你的雄心//雄心如破壳/在墙角踉跄几季的酸辛”。值得注意的是,当第二种日常结束于天赋彻底被世俗掩盖之际,日常的第三种定义也呼之欲出,“平常”之所以是“必不可少武器”,还在于它也是一种提升修为的磨练。此处有一个对于诗人极为重要的意象:瓷器。

在这部诗集中直接指涉这一意象的诗主要有两首,皆写于2010年8月。时间靠后的一首题为《学习》,诗人在其中将瓷器、狗、婴儿、树、灯、佛像这些“沉甸甸的存在”与“我”做了对比,它们的优点——不变旧、赤诚、耐心、面对时间的从容——统统是“我”欠缺的,而“我”仅是“一具逐渐凋残的肉体”。在时间靠前的《瓷器》中,诗人更具体地枚举了瓷器的优点,它能“使生活闪闪发光”;它是泥土的浴火重生,所以也是“泥土的凤凰”;它的“恒久映衬着人世的易变”。然而,瓷器又“活得那么清脆/在唯一一个摔打的时间/就碎得干干净净,无可挽回”。几乎可以断定,与其说诗人“想把歌咏献给这美丽的存在”,还不如说是将其已想象成了这类瓷器。天赋与日常的分叉,又黑夜与白昼的对峙,在此变形为那个古老的肉体与精神的二元论。泥土便是肉体,经过1000多℃高温焙烧化作瓷器,正如历经磨练的肉体中有精神的飞升。

对诗人来说,这就是日常第三种定义,即个体必须将肉身想象成一尊易碎的瓷器,以此护佑那“不可摧毁的事物”,也以此扫除那“我是否会不同”的执念,(《我》)免于“一日又一日/我不重复了人类的命运”生出的焦虑。归根而论,就是要扭转胜败输赢的人世逻辑,因为对生命来说原本没有胜者赢家,有的只是“屋子就是你的天下”,(《打扫》)你必须“洗净自己”,与自己坦诚相见,(《在夜里》)“目光退回身体/用消瘦的皮肉培植一朵莲花”。(《监考》)如果说这部诗集展示的是作者20年来生活之历程,那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通过日常的重重新定义,诗人消弭了文学与生活的古老敌意。写于2011年的《无题》即是展示这种精神新变的证词:我正在经历的生活/就是我最唯一的生活。

■短评

山乡巨变的精彩书写

□刘雪琳

步入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三湘大地,青山绿水,乡野田畴,传颂着脱贫解困奔小康的感人故事,映照“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变迁。文学记录时代,讲述脱贫攻坚湖南故事的“梦圆2020丛书”直面生活,提炼现实的艺术审美,将脱贫攻坚重大主题揉进日常生活叙述之中,以文学的力量发出新时代脱贫奔小康的昂扬斗志与坚定意志,既体现了湖南文学人、出版人的担当,也是向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献礼。

脱贫攻坚事业寄托着党和人民的殷切期盼,扶贫题材也必然是非常重要的创作题材。脱贫攻坚在三湘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和先进典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沃土。身为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湖南精神的传承者、脱贫攻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秉承“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文化血脉的湖南作家以时代为己任,追随脱贫攻坚的铿锵脚步,探索取得的物质之变与精神之化,用手中之笔书写着这一壮美的时代命题和伟大的社会实践,皆呈现在“梦圆2020丛书”之中。

“梦圆2020丛书”由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和综合类三部分构成,其中长篇小说4部,报告文学4部,综合类1部。它们既记述了落后地区的贫困之疾、生活之困、生态之忧,也书写了扶贫干部的无私之举、贫困者的信念之变、全社会的力量之大;既有润物无声的凡人凡事,也有光可鉴人高尚情操,动人心魄的扶贫壮举,以生动的表现形式,丰富了新时代关于乡土书写的文学长廊,描绘出一幅幅感人肺腑、充满时代气息的扶贫脱贫画卷。

长篇小说《火鸟》描述了跌宕起伏的扶贫战役,其中不乏令人动容的人性温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小说讲述的芙蓉县走马乡青山牛、耳朵山是地处大湘西的一片神秘魔幻之地,也是深度贫困之地。2013年,文化扶贫干部金蓉珉与年轻一代的村支书王九哥通力合作,在精准扶贫“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对青山山村的扶贫进行了“精准”设计,发展产业,帮助村民摆脱了贫困。2016年,金蓉珉再次主动请缨参与新一轮帮扶,步入新的扶贫战场,打通了耳朵山村进城的隧道,也打通了芙蓉县“扶贫的最后一公里”,以“精准、使命、责任”为刻度,刻下了本轮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标。《青枫记》以汪达成从深圳回乡创办青达公司和C银行扶贫驻村帮扶为主线,巧妙地将精准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和西部开发、产业转移、农村城镇化以及基层党建等融合起来,弘扬了诚信和担当、勤劳和节俭、友善和互助等,展现了人们齐心协力脱贫致富的美好愿望和发奋进取的精神。《守望》的主人公是第一村支部书记兼工作队队长张天益,立志通过实干和努力让该

村脱贫致富,最终通过建设度假区,帮助天井寨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印象深刻。《相思山》通过描写相思山自然风景、传说故事、苗寨风情,各级干部直面矛盾,成功开发相思山旅游景区的故事,塑造了一批敢想敢干、勤政廉政为民的干部群体形象。

报告文学《石头开花》聚焦武陵源人与贫困决战的奋斗精神和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折射出“旅游反哺农业,扶贫对接旅游”的生动进程,探讨了乡村旅游、多维贫困、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等问题。作品纪实与思辨并驾齐驱,诗性与理性互为呼应,构成了复调协奏的基本格局,从中可以聆听到历史与现实的协奏、乡村与城市的协奏、光荣与梦想的协奏。《家是最小国》以家庭扶贫为切入点,从十八洞村单身汉脱贫、经济帮扶、扶贫扶智等多个方面,书写了“精准扶贫”政策为贫困地区个人、家庭带来的幸福生活,体现了国家政策落实到个人层面的显著成果。《三湘往事》描写了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各种电商平台应运而生,四通八达的销售网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扶贫,书写了湖南人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中的务实与担当、坚韧与图强,以湖南电商故事折射出属于中国的电商奇迹。《雪峰山的黎明》从屈原与淑浦的文化背景切入,浓墨重彩地再现了一大批文化旅游创业者的鲜明形象和心路历程,他们坚守文化自信,发挥创造精神,终将一方穷山窝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文化旅游区。

综合类《天总会亮》包含中短篇小说、中短篇报告文学、散文、诗歌以及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作品。这些作品富有浓郁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展示了湖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感人事迹,表现出了人们努力奔小康的奋斗精神。作品主题鲜明突出,基调积极向上,刻画与颂扬了参与扶贫开发事业的最美人物、典型模范,讴歌人间真情、传递社会正能量。

梦圆2020主题征文是湖南作家参与脱贫攻坚的创作实践,为山乡巨变做出的精彩书写,是湖南文学对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贡献。很多作家多次深入贫困村、贫困户实地采访、体验生活,有的甚至当上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正是这样的身体力行,湖南作家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抓住脱贫攻坚的本质,将置身脱贫攻坚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融入脚下的土地,融入乡村的今天与未来。他们在创作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新人物,书写出有情有义的新生活,作品因此有了温度、高度和深度,也彰显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理想追求,更从历史和未来两个向上清醒认识到脱贫攻坚的深远意义,体现出当代文学“人民性”的价值导向。